

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分析范式

王胜利 伍 珏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摘要】文章对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思想从“场域”概念、法律、惯习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布迪厄认为的“场域”实际就是“制度场域”，社会制度就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子制度场”构成的，法律既是一定的规则、正式的制度和技术，是社会斗争行动的资源与框架，也是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机制与媒介。非正式制度的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文化制度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它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存在。

【关键词】皮埃尔·布迪厄 场域 法律 惯习 文化

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6-0123-04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是20世纪法国最具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涉猎了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哲学诸学科，塑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创造性地运用系统论、普遍联系和认识论等哲学思想，使其社会理论表现出生成结构主义、关系主义和反思性的分析维度，并以此克服“二元”对立式的研究，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杰出代表。布迪厄的制度分析范式也建立在这理论基础之上。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其制度思想内容进行分析。

一、“场域”制度分析新视角

布迪厄的制度分析是从“场域”(field)展开的。“场域”这一分析单位来自他早年人类学研究，并作为其制度观的重要内容。制度场中充满着竞争，个体可选择相对的竞争策略。资源既作为制度的目的，又作为制度的手段。制度场有自主的均衡趋势，同时又受到更大制度场的限制。而惯习是制度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作用独特。

(一)制度和“场域”

制度是指“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人类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利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1](P253)]换句话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互相交换行为的框架。制度可分为最基本的两种形式，一是由权利机构制定和实施的，由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组成的正式制度；二是由习惯、习俗、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二者的区分在于操作化的差异，故产生了定

量、定性两种分析方式。应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加广泛。

“场域”是布迪厄理论中重要的概念，也是其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P134)]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而场域中各种制度交错纵横，或者从根本上讲场域是制度的场域，即“制度场”。社会作为一个“大制度场”就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子制度场”构成的。

(二)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及理论取向

在把握既高度分化又内在联系的场域的分析模式问题上，布迪厄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博弈论——不谋而合。他既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赞成“整体主义方法论”，而是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从场域入手)的策略，即“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也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2](P146)]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不坚持单一的微观或宏观评估制度的僵化分析格局，而致力于引入中观层次的社会学假设，以建构具有动态张力的均衡式理论模型为目的。

以此为基础，布迪厄坚持用以下几方面的制度观作为基本的理论取向：

第一，假设制度场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内部封闭的社会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差异与融汇”[04CSH003]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制度社会学论纲”[09SSZD07]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王胜利(1965—)，男，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制度社会学；伍珏(1989—)，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11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间。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就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布迪厄说:“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2](P138)}因为“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2](P145)}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制度构成,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

第二,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场域,其更倾向于一种客观的人际关系系统,而不是实体系统。这与布迪厄关系论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布迪厄说:“‘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2](P133)}“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2](P145)}“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2](P133)}因此,“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2](P134)}“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2](P155)}

第三,场域是一个关于制度的“博弈”(game)空间,不断博弈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不同主体具有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同评估,导致以下潜在可能性的发生,即出于评估主体地位的变化,场域被赋予新的制度——一种均衡被另一种均衡取代——制度变迁出现。布迪厄说:“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2](P130-140)}

第四,制度场的边界是经验的,制度场间的关联是复杂的,这取决于制度内容——正式与非正式——的复杂性。“场域的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布迪厄认为,“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numerus clausus)出现”,只有通过每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经验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个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如果非要从理论上确立一条划定场域界限的原则,只能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2](P137、138、139)}。

第五,文化的自主性是制度场域的重要标志。场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文化倾向和文化承载能力,其不可化约为其他领域的决定因素。比如说,在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科学场中,潜在的制度或文化取向就是“为真理而真理”。其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起作用,唯一起作用的就是科学资本或学术资本。然而,制度场域的自主化只是相对的,没有彻底的自主场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制度替代后总留有原制度势力的影响,或者在制度替代过程中部分地融入其它制度,并发展出一定的势力。因此,场域制度的自主性程度取决于其文化承载力的大小。以这个为标准,自主性最强的场域是科学场域和高层次的艺术场域,自主性程度最低的是政治、法律场域。

二、法律:正式制度分析

布迪厄认为,法律场域仍较少自主性,因为法律场域解决的完全是整个社会问题(自然的包括社会实体和意识形态);并且法律场域并不能摆脱社会力量与世俗权力力量的干预。这与其可操作化且保持独立的理论承诺是相抵触的。

布迪厄认为,从场域的视角出发,法律既是一定的规则、制度和技术,又是社会斗争行动的资源与框架,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机制与媒介。“法律的社会实践事实上就是‘场域’运行的产物,这个场域的特定逻辑是由两个要素决定的,一方面是特定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是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前者为场域提供了结构并安排场域内发生的竞争性斗争(更准确的说,是关于资格能力的冲突),后者一直约束着可能行动的范围并由此限制了特定司法解决办法的领域。”^[3]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取决于在特定的时刻下:“法律理论家”与“法律实务者”在制度场中的力量对比,他们各自法律观和法律解释能力,还取决于法律解释行动者的“场域”位置,包括资本与策略。

布迪厄确立了分析法律这一制度场域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宏观上明确法律场域在政治权力场域中的位置。第二步,中观上分析场域中各位置关系的客观结构,即描绘出法律行动者在制度场中的分层,以及各层次为了争夺这个场中的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最后的步骤就是微观的定点式分析,确立出场域中占据各种职位的人所特有的惯习的性质,如法官过去的教育背景、性别、年龄、职业等等对法官司法的影响。

用场域理论研究法律,最重要的是要从博弈论和均衡论的视角来研究,即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意有形的实体。比如对于法官角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这些研究都是从实体主义角度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往往只关注特定的法官,他们忽视了从法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出发去了解每位法官的特点。一旦在研究中忽视了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很可能对一个自认为了如指掌的制度却一无所知,因为抛开了它与整体的关系,我们就根本无法把握。用场域的路径研究法律,就不能片面地将法律看作规则的推导或社会控制的工具,而应破除这种“误识”,把法律视作动态的实践。在这两种不同逻辑的场域实践中,当事人、律师、法官等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与行动,获取各种资

源,争夺有利的位置。

三、惯习与文化:非正式制度分析

只考虑正式制度而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场域,极有可能导致由方法论的缺陷而引发的整体理论的狭隘。非正式制度被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操作化上的困境——概念量化困难或根本无法量化,如回避这一问题必将遭遇理论发展的瓶颈。非正式制度不仅在制度场中有无法取代的位置,而且它会不断地渗透到正式制度当中。一般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以下功能:简化正式制度的繁琐程序,节约交易成本;决定群体的承载能力,维系整体内部均衡(高效或低效均衡)。布迪厄的非正式制度集中在惯习(habitus)和文化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上。

(一)惯习

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作为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而惯习是最为基本的概念。这一非正式制度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内化于个体并能在群体内普遍的感知或传递,是整体交流、联结的纽带。持久的是指,即使这些禀性在经历中可以改变,但其会潜移默化的植入个体的深层意识之中,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而形成某种连续性。惯习是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

第二,惯习是制度行为的结果,并且最终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布迪厄认为,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尽管布迪厄把惯习视为一种主观性,但他从来不认为惯习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这正是他一贯所反对的),而是与客观结构(制度场)相联系的主观性。这就是说,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

第三,惯习是集体的产物,又起到增强整体行为的可预期性为集体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2](P171)},因此惯习具有个体性。然而,惯习具有个人性,但社会不是“原子化”的,惯习还有集体性。因为“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我们提惯习,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2](P170)}。布迪厄以阶级为例,阐述了惯习是如何为群体节约了交易成本:“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许多人的惯习具有结构上的亲和(structural affinity),无需借助任何集体性的‘意图’或是自觉意识,更不用说(相互勾结的)‘图谋’了,便能够产生出客观上步调一致方向统一的实践活动来”^{[2](P169)}。

第四,惯习具有的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决定了其造就在制度变迁的重大契机。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布迪厄将时间变量引入到惯习的分析中,指出“惯习不是宿命”,“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double historicity)。因为惯习“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ontogenesis)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

(phylogenesis)”^{[2](P184)}。惯习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2](P178)}

(二)文化

社会主体生成与存在的现实场所又是文化场,那么文化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成为文化分析的关键。文化场是指组成客观社会层次、生成与授权某种话语模式和行为的一系列制度,仪式、习俗、概念、名称、职位、头衔等的存在空间,其直接物化存在形式诸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艺术团体、宗教组织、专业协会、基金会或研究会、幼儿园、家庭。作为主体进入社会或劳动力市场之前的中心语境,文化场在很大程度上塑型了主体观念和行为。因此,理解主体行为及其发生的语境关系成为理解布迪厄文化理论的关键。

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文化制度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它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存在。这种社会制度通过对文化能力进行授权,例如授予文凭、职称等,而将文化能力标签化。文化制度中包含着类似官方承认的保障,它的存在使文化能力处于持续的证明的压力之下。文化制度对文化能力的承认中包含着体制化的武断性,它的承认和授权往往代替了对文化能力实际情况的探究。文化制度有三种作用:(1)它使文化能力超越了具体化的个人的生物局限,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存在。(2)它使文化能力的拥有及其差异得到合法性的确认。(3)它使人间文化能力的比较具有了某种操作的可能。布迪厄认为,文化制度的背后是强迫别人接受由部分人制定的“社会公认性”的权力。

文化资本是文化场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作为一种价值形式,文化资本是指经过社会授权的审美品位、消费特征、归类属性、操作技巧、奖惩常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依靠社会领域的文化机构和大众意识塑造来完成,其基本方式就是文化资本的普遍化。随着文化机构价值普遍化的进行,社会主体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主体认为“真实”的主体幻觉,或主体的无意识规则感。主体被蒙蔽在某种游戏规则中,相信被社会化了的规则类似于客观真理,忽略了规则的社会建构性。

主体的话语、性格、习惯等由其习性而生成,通过代代遗传,通过教育和文化习得。这种主体身体层面的常规或习惯性决定着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里,布迪厄试图解释主体实践的逻辑问题,即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主体为什么是无意识的。“一切都是社会的”是布迪厄长期呼喊的口号,也是他理解文化活动和主体行为的切入点。按照布迪厄的理解,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还是康德的“绝对精神”,都是社会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这里,布迪厄的习性观念与客观主义划清了界限,也与主观主义划清了界限,因为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观念和行为是由诸如与阶级、种族、性别及语言有关的客观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主观主义则认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决定社会现实。布迪厄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了认识主体心智过程和行为方式的中介。

习性—实践—结构—习性是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主体心智与行为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体的动作、说话的样子、情感形式、思维习惯都是习性的产物。而且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常存在于诸如打扮、装束、行为、语言交际这些看来并不重要的主体习性之中。因此,不但身体存在于社会场域,而且社会场域也同样存在于身体中。

习性及其运动轨迹具有无意识性质,在无意识作用中对主体发挥作用,通过跨越场域对主体在其它社会文化活动的思维和行为进行控制和疏导,保持文化生产的连续性和遏制性,隔场发挥作用。例如在其《国家贵族:权力场域中的精英派》中,布迪厄把习性的不同形式拓展为一种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于是习性是社会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继续阶级分裂,保持阶级距离,维护阶级关系,其结果是在整个差异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合法化社会实践。

四、结语

布迪厄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分析路径是:制度场是制度主体的关系存在,制度场塑造了制度主体的惯习,制度场也是非正式制度的场域;资源——尤其稀缺资源是制度场运作的前提,实践是行动者的主动性活动,其最终把惯习、资源和制度场等联结在一起。这一系统研究的思路,启迪我们在分析制度问题时,必须注意制度概念簇群中的制度生成体的权能,制度生成体的价值取向、稀缺资源的分配、制度承载体的反馈及其影响等这些概念之间相互交织的辩证

互动关系,并理清这些概念的不同功用与意义。

总之,布迪厄的制度“场域”理论通过对社会行动者及其行为的全方位阐释,形成了对制度基本理论研究的创造性拓展,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建树,为我们从新视角研究制度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R.科斯 A.阿尔钦 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3] 皮埃尔·布迪厄,强世功译.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EB].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7697).
- [4]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 [5] 刘拥华.布迪厄的终身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6] 皮埃尔·布迪厄.遏制野火[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 [8]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9]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上接第122页)究,而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方式必然肢解人类整体思维的模式。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

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在当代就完全成为一种乌托邦了呢?笔者认为不是。在笔者看来,全面发展应该要围绕“全面”这个核心,即通过改变人的日常生活来引发社会的整体变革和个人的解放,实现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p85}但马克思这种全面发展的总体人格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列斐伏尔对总体人的理解是比较符合当代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在他看来,全面发展的总体人本质上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理念。他在《社会科学的总体》中,强调了全面发展的总体人格的开放特征。在他看来,这种开放的总体人格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它潜存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异化,并最终趋近于全面发展的总体人的过程。可见,全面发展的“总体人”并非完全的空想,而是一个社会发展不断趣近的目标。

总而言之,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始终指引着人类向前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不能将它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或实际的历史状态,因为它的作用是调节性的,是一种永远激励人们去实现的终极理想,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目标。任何试图将它

当作现实的目标来实践的观点,都是对它的歪曲。当然,其结果也必然事与愿违。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法|拉伯雷.成钰亨译.巨人传(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3]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德|伊曼努尔·康德.全增嘏译.宇宙发展史概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5] 法|卢梭.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6] 法|圣西门,董果良,赵鸣远译.圣西门选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 匈|卢卡奇,杜智章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